



# 用民族志方法书写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的村落关于写文化的对话

[文章编号] 1001-5558(2009)03-0131-09

● 高丙中 李 立

[摘要] 这个对话围绕的主旨是如何在村落、如何在当下书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怀的民族志。这种民族志所要求的田野作业必须正视知识生产的在场,把乡村设定为村民、知识分子和国家发生持续互动的舞台。

[关键词] 民族志;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生产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李立博士选择贵州屯堡做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志研究。在他来田野地点之前,已经有多批学者在当地做过蹲点调查,也有一些著作已经出版了。<sup>①</sup>政府部门在学者的配

[基金项目] 这一整理文本的研讨基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建设”(项目批准号:06JZD0006)的设计,也是200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文化的书写’到‘书写的文化’——民族志叙述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07CMZ009)的工作。

<sup>①</sup> 例如:何平.贵州安顺地戏[J].戏剧艺术,1983,(3).歧从文.安顺地戏面具[J].贵州文史丛刊,1985.曲六乙.建立傩戏学引言——在贵州傩戏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7,(2).沈福馨、帅学剑等编.安顺地戏论文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王秋桂、沈福馨.贵州安顺地戏调查报告集[Z].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邦氏民族文化基金会,1994.孙兆霞等.屯堡乡民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TIM OAKES、吴晓萍.屯堡重塑——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朱伟华.建构与生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合下把当地的“跳神”先是界定为“地戏”，近年又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村民在这个过程中也学到了很多知识，接受了一些外部传入的名词。在这里，是以单向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模式做一个单纯的遗产项目的民族志，还是以多主体互动关系模式做一个把遗产项目与它成为遗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包含其中的复杂民族志，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整理的对话就是李立与合作导师高丙中围绕这个议题所进行的多次讨论。

## 民族志书写

李：高老师，我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您很强调民族志书写的问题。您说中国需要大量的民族志来呈现我们时代的风貌、我们社会的景观。

高：我觉得，人类学发展到你们这代人，要着力于“做”，做人类学，而不再是学习人类学的那些基本知识。人类学还真是“做”出来的，“做”，首先就要落实到民族志上。中文的人类学是什么水平，要看民族志有多少，民族志的文本有多复杂，有多丰富，有多少智慧含量。这才是体现你这个国家有没有学术的所在，还不仅是人类学本身的问题。你们这一拨人确实都在做人类学，而不是学人类学，或谈人类学。很多人是在谈人类学。还有人在用人类学，他不做，但他用人类学的东西做其他的事。我想再过十年左右，中国人类学应该有一个不错的格局，就是“做”了最基本的民族志工作的格局。

李：您在商务印书馆主编的那套“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精选了西方人类学史上经典的民族志文本，何以一直延续到后现代倾向的作品？

高：西方民族志有自己的规范，它的规范有它形成的过程。早先有一大堆人在写人类学的东西，但不是现在这个写法。之前的民族志奠定了一种基本方法，它认为它做的是科学的民族志。至于哪些方面可以称为科学，它自认为已经讲得很清楚，但别人又认为这恰恰不能被称为科学，于是有了批评、反思和重新定位。

李：我发现有一些人类学的论文中，“反思”、“后现代”会被嗤之以鼻，认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类学的现状。这是为什么？

高：与“现代”或“现代性”所诉求的相比，“后现代”是一种更复杂的思想过程，文本也更复杂，这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学术要看智慧的含量，学术从来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规矩、规范，那些称为规范的东西不过是为训练学生而制定的，要做出好的研究，哪里是什么规矩的问题！你做了比别人更好的东西，显出大智慧，就是一部大作。现在我们就是处在后现代的知识氛围中，对后现代的东西置之不理，不以为然，而是去做一个前后现代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事。方法的正当性和知识的正当性全都有问题，不面对不行的。

李：前段时间看了您主编的“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中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和《纳文》两本。<sup>①</sup> 第一本已经看完了，后一本看了一部分。

高：《纳文》的叙述很有启发——怎样叙事，怎样陈述自己的观点，怎样改进方法。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些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把对象研究出来了，把知识生产的过程也交代了。它

<sup>①</sup> 拉比诺.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M]. 高丙中、康敏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贝特森. 纳文[M]. 李霞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的方法的自觉、学术范式的自觉就是它的价值。你可以此为基础。

李: 有的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您所说的这些。

高: 因为他们没有你这样的机缘巧合。其实对一本书的感觉, 就像男女交往一样, 它是你的对象, 是你的唯一, 也是你的世界, 如果在茫茫人海中你们擦肩而过, 也就跟不存在一样。比如在你研究屯堡之前, 已经有很多人到过屯堡, 写过屯堡, 许多人可能把这看作缺点, 看作研究的阻力, 认为别人从各个方面做过了, 我很难做出新意。我们认为, 被人做过, 我再来做, 这恰恰是我的另一种机会, 意义只对有这种方法论追求的人存在, 对那些没有方法论追求的人来说, 就觉得你第一个来, 你说什么都是新鲜的、有价值的, 今天我来, 你所说的什么都是说过的, 就没劲了。如果我重新在一个新的方法论上来做研究, 甚至正因为你做了, 我才能显示出我做的东西不一样, 如果你没做过, 我怎么显示我做的不一样呢? 如果你都没做过, 我怎么显示我所做的是在一个复杂的范式上做的呢? 正是因为你在这种背景下, 《纳文》和《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的文体才会对你有真的帮助。这个时候, 你才特别能接受这样的书。

###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意义

李: 您的那个课题要研究、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作为课题组成员之一, 我去贵州安顺九溪村考察那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戏”。“地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不过, 他们现在更关注“屯堡文化”这个概念。地戏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已经兴起, 而“屯堡文化”的概念要晚一些, 它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 大家都在讨论“屯堡文化”。地戏被“封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盖棺定论, 大家就不大重视它了。

高: 早先有些学者去, 说地戏是“中国戏曲的活化石”, 通过很专业的角度来看它的意义。但那是学者自己的东西, 怎么跟他人的生活联系起来? 是什么让它们联系起来? 因为你作为知识分子是把特殊群体的东西转换成你个人的, 把个人的东西转换成集体的东西与他人的东西。我在《文艺研究》上发表了篇文章《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sup>①</sup>, 你琢磨一下, 很有意思, 很可以发挥的。文化本是私人持有的, 它是你的, 不是我的, 怎么最后一个私人持有的东西就成大家的东西了, 说这是我们屯堡的, 这是我们贵州的, 这是我们中国的? 其实通过知识生产, 文化的归属、认同就出来了, 它的共同体就形成了。一碗稀饭, 你吃了别人就吃不了, 可文化是这样的: 他说“是我的”, 如果你们这么多人也都说它是你们的, 那么, 它的价值反而变高了, 持有者也没吃亏。这东西本来不被你们意识到是你们的, 但你们现在说是你们的, 后果就是社会被这样构成了, 知识在其间产生了作用。

李: 在村子里, 我遇到了一位“田野战友”。我俩在研究方法上不尽相同。《屯堡乡民社会》<sup>②</sup>把九溪村的人分为精英、大众、边缘三类, 呈纺锤形。他们接触的主要是村内的精英。我第一次也住在精英家, 是当地师专的老师引荐的, 但后来发现, 住在那里有一些问题。精英很忙, 他所提供的信息很多在《屯堡乡民社会》中可以找到。第二次, 我换到一个以做糖为业的老人家中住, 这个老人对地戏戏谱倒背如流。从第二次开始, 我与大众接触比较多, 与他们

① 高丙中. 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J]. 文艺研究, 2008, (1).

② 孙兆霞等. 屯堡乡民社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相处很融洽。接触到更多的村民,为我的研究打开了新视野。我发现对于地戏来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的生态已经被打乱了。过去,它一年只跳两次,每次要跳完一个完整的本子,时间跨度很长;现在,跳的时间变得随意,跳的内容也只是截取最热闹的片断,成为旅游展演的一部分。我在那里时,村里来过好几拨人,有香港的、日本的。还有一次,是来拍广告片的,村民都被动员起来,在广场上协助表演。外面参与得越多,地戏越没落,这是我最初的印象。

高:我们去村落做民族志研究,归根结底是要理解他们。看了地戏,你理解它是一种本事;不看地戏,你能理解它也是一种本事;看地戏和看别的东西结合起来,能理解它,也是一种本事。所有东西全只是媒介。这根本是一个随意、随机、无意、偶然的组合,并不要求研究者特别要做什么,绝对不做什么。如何才算理解了?我说我理解你没有用,而是要把理解表述出来,表述出来后这个理解成为有意义的,有学术意义、社会意义的。学术就是这样,理解是第一步,我把理解表述出来,产生了学术的价值。比如你说一个社会是这样的,其他人没有说过,这便增加了社会的新知。社会意义方面,比如我们谈论一群人没有道理地被排斥的现象,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或者说一群人因处在权力的某个层面而付出了什么代价,引起社会的某些后果,唤起社会要做什么、要放弃什么或改变什么的诉求,等等,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意义。经验研究必须是与社会相“合”的,为什么强调整理解?因为我已经是“合”的,我的知识才可信。为什么不像小说那样根据想象来编一个新的模式、范式呢?为什么要根据一群人来写呢?经验研究必须有经验支撑,是存在过的,是事实,所以一定要证明我是基于事实达成理解的。

刚才你讲到地戏,有些人看地戏表演,看演员们走来走去,面具五花八门,其实只看到了有一个仪式活动,一群专门跳这个的专业或准专业队伍,只看到一个文化模式。其实,单独看这些东西,你根本没办法理解老百姓的生活,它只是文化的一个环节,要放进整体中才能理解。关键问题是他们把它放在哪个位置呢?当然,经过界定,在很专业的领域,它是有价值的,比如在纯粹的戏曲领域,那是有学术价值的,被称作“戏曲活化石”,等等,但社会意义呢?你对老百姓说这是“活化石”,关老百姓什么事?老百姓有义务帮你保存“活化石”吗?你给他钱吗?你养不养他呀?这对他们就没有社会意义,就是为你们保留了一个学术价值。当然,这个话要看什么时候讲。为什么前些年要说这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不这么说,就会被赶尽杀绝,就不会让它们存在。“活化石”对知识分子的学术有用,所以它应该保留,最起码不要赶尽杀绝,还要传承下去,间接地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存在的正当性和保留的理由,间接地进行了这种认证。社会意义是衍生出来的,而不是直接论证的。你做一个转换的方式,让你的知识生产产生社会意义,就是说现在再来看,你还做这种研究,它的社会意义何在呢?如果要顺着这样回答,为什么?喔!现在国家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当然这也可以说有意义,是学术意义,但这不是那种根子上的,不是大的关怀,不是能显示更复杂的智慧的意义。我们要在某个地方建立一种新的联结,而不是很随意的,不需要动脑子的。别人进一个村,你进另一个村,别人写萨满,你写地戏,这种学问做不做,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区别?

李:您说的是不是这样三层意义?第一,它是经验研究,不同于小说虚构,必须要到那里。第二,涉及研究意义,学术上的,对学科的意义包括民族志的表述方法,等等;第三,那些人也有朴实之处,有时我也会反省,我研究完后走了,能带给他们什么?当然,我在那里也尽



量帮助他们，拍照，帮他们洗照片，但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很多我都不能做到，就是您所说的社会意义。

高：经验研究有很多微妙的方面，以前我们没有认真谈过。为什么要强调规范？是为了满足它的要求。社会意义有两个层次。你在那个地方，社会成员中增加了你，你给别人带来的是欢乐，还是美好的记忆？还是人生中视野的开阔？你是增加了他的东西还是限制了他的可能？这是最基本的。另外一个可能性，他知道在北京或昆明有一个自己说得上话的人，自己如果对他有什么请求，他会关照自己、帮助自己，最起码给自己提供一些信息，对他来说这是很实在的方面。

还有一个层次是知识生产中知识的社会意义，知识成果、呈现方式的社会意义，你要把这个考虑进去。为什么你关心这个问题，而不关心那个问题？为什么你从这个层面，而不从那个层面？因为你觉得你的这种知识呈现的社会意义不一样，你看重的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前面你说的是日常生活、调查期间给别人、那个社区、那个社会、参与者带来的后果，这是一个学术伦理的问题，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而后者是学术智慧的问题，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田野中的伦理问题很复杂，有时候学者就是“剥削”，他只是要资料，要攫取。

李：是啊！确实是一种“剥削”，带有目的性。但其间也有真情实感。

高：你当然有目的，他跟你交往也有目的。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中阿里跟拉比诺交往，要他带自己去哪里，也都是要用他，一样的。他用你时，你尊重他的“用”，你要用他时，你尊重他的“用”。他不质疑你，是因为你是知识分子，他没有能力、没有武器质疑你，你质疑他，说：“你小子就想利用我，我看穿你了。”这就属于不讲道理。你利用别人可以，别人利用你就不行了。当然也可以谈判什么的。当别人利用到你时，你能够善意地理解，也能够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配合，就像你希望你做调查时别人配合你一样，这是对等的。

李：能不能再谈一下刚才您说的知识生产所呈现的社会意义？

高：你需要最后写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就是知识生产的最后呈现方式，是一个文本、一些图片、一部电影，是要给一定范围的受众看的，看完之后会产生社会后果。这个后果是你先知道，先有预期的，你就按预期来打造。人做事情就是因为你先知道有这个后果，尽管它的后果并不尽如你的预期，但程序是假设你先知道后果，你才做这个事。当然，歪打正着的后果，经常也有这样的事，那就看你的判断能力。

李：您的这两个“社会意义”解除了我对自己工作意义的困惑。

## 知识生产

高：不同阶段的知识生产，结果是不一样的。博士生由于阅历、经验以及文本规范等各方面的局限，他主要考虑的还是怎样做一个中规中矩的东西。虽然他抱着做一个好东西的理想，最后的产品却可能还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东西。这也不错了。过了这个阶段，就要考虑怎样做一个有超前的预见、立得住的精品。二者的欲求是不一样的。

李：我这次去的九溪村有一个特点，就是学界的介入比较多。它不是学术的处女地，已经被开垦、精耕细作过很多遍。围绕这个村落甚至可以勾勒出一个小小的“学术共同体”。这与我原来去的四川藏区那个村很不同，那里几乎没有学界的影响，这是二者最大的差异。

我想，九溪村的这一特点，也代表了许多像它一样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其他事象而闻名的村落共同体的文化生态。但我发现绝大多数研究者的目光关注的是对象如何，包括政府、村民、市场等等。在对这个村落研究时，我该不该把围绕它的知识生产作为重点来探讨？

高：你的这个例子、这个角度正好说明，人类学者现在要研究一个纯粹的对象是不可能了，根本就没有一个纯的东西了，所有的社会都被笼罩在现代、后现代所纠结的氛围、观念里面，被完全置入了被知识建构的层层累叠的社会、人心之中。在知识体系之外，不可能另有一个社会存在，在现代表述体系、媒介体系之外不可能另有一个社会存在，必须客观地去观照它、研究它。你原来去的那个藏族村子有没有这样的时代特点呢？这不是只看它后来有没有人继续去做调查，而是说它还是会以别的方式置入现代里面：他们的孩子也上学，他们也与外界有信息交流……只不过你不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而已。当然，我们选择研究角度还是要考虑它的典型程度更偏向哪一方面。

但是好多人的做法未能抓住每个村落的特质，例如一些人去九溪，可能也按你原来做藏族那个村落的方式去做，可是更能体现今天来做田野、做知识呈现的方式恰恰是我们后面谈到的那种角度。学者一遍遍地往这个地方跑，这个地方已被一遍遍地表述，这个表述当地人也会略有所知，后来的调查者也会看到前辈的文本、报告。所有的这些个人、社区都处在一种饱和、厚重的知识的包裹之下，这样一个观念在你那个藏族村落不能很好地体现，按照一些人做九溪的方式也不能体现这个特点。

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角度，真正地体现了我们做的民族志恰恰是在一种很复杂的知识关系之中，这个地方的存在和呈现方式都处在一种复杂的知识交织之中。你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主体在活动，我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主体在活动，我们在互动，一起在与当地互动，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这体现了当下时代整个知识生产的方式。以这样的角度和认识来做这个地方，才能做出很好的个案。那种假设还存在一种前现代的田野，或者现代是发生在别人那里，没在我这里的一种对时代的设定与现实相隔太遥远。他的假设就跟他对社会的判断不一样，他假设的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把其他的可能性都堵死了，怎么可能做出一个复杂的东西？在人类学里，你作一个原始社会的假定和作一个现代生活的假定，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虽然物、事、景你都看到了，但不会往脑子里去，基本上熟视无睹，就是这样。有这个观念你才会凝视它，没有这个观念你就不会凝视它。只有在这样的假定中做的民族志才真正是这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这个时代知识氛围中产生的东西。

李：是呀！以我的体会来讲，之前的人对村民的影响的痕迹我无法摆脱，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也不能漠视，要么超越，要么吸取。总之，他们会对我造成一种影响。在我之后进入村子的研究者，他们的情况与我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高：别的学者去过，你不能假设这些人没有去过，自己在一个纯粹的认知的起点上跟对象发生关系。实际上，他们原来已经建立过很多的支点，你必须梳理和这些支点的关系后，才能找到你的支点。他们和那些人打交道之后，你不能假设他们之间的访谈、构成的议题对他们没有影响，或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恰恰是他们打交道后，有些人慢慢被筛选出来，因为他们的名字会出现在那儿，大家会自然把你引到他那儿，说因为他已经上过书、上过报了，这路径就形成了。以前的人问过这些人一些问题，他可能会揣摩怎样说可能更受你们的重视，对你们来说更有意义，他已经形成套路了。所有的这些恰恰说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状态，今



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一个纯粹主体与纯粹客体相互发生认知的这种知识生产关系。就像说当今没有一个物是纯粹物，它都包裹着各种各样既定的现成的观念，我们没有办法从一张白纸开始，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在历史积累的尘埃当中了。就像今天的孩子，他一出生就已经吸着被汽车污染的空气，可我们还假设这孩子生下来面对的是一个清净无染的世界。

你做民族志研究，你要交代你知识生产的关系，这是中国人和中国学界特别需要在一个个案中呈现出的。这种观点在西文文献中已经有了，但是要让我们整个学界能够感受到，我们确实处在这个之中，需要你给我们这样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在此之中，把这个呈现出来。这样你整个的研究目的不仅是对一个特定领域有价值，还对整个中国学界的方法论的讨论和知识生产的复杂性提供了平台。我们是在认知到知识生产的复杂性情况下进行学术研究，还是在天真地假设天真的学者和单纯的对象这样的前提下做学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点和背景。如果你通过自己的专门研究把这一点也能包括进去，也是你整个研究的一部分，或者你在方法论上达到的新的高度。不管你的研究是否成功，这个意义是毫无疑问的。

李：我有一个担心，写知识生产者会不会触犯某些学术禁忌？那些作者与我私交很好。

高：追求新知、追求学问是没有禁区的。这个勇气都没有，那还做什么学问？当然，可以注意处理的技术性、技巧性。作笔记时是原始记录，正式写作时你不写他的名字就是了。再说，写他说过什么有何不妥？我们写村民谁和谁结婚、谁和谁有婚外情、谁和谁有矛盾，什么都可以，怎么到写学者在那里怎样活动，就成禁忌了？

李：就知识生产层层累叠的新机制方面，这块田野应该是个不错的范本。

高：你最后的报告可以分两个问题来写。首先，应呈现这样一群人，他们是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民，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生活中文化的维度在哪些方面能够展现出来，这是基本的。其次，你呈现的方式以及你的反思，就是关于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内容，将二者糅合在一起。你对知识生产的反思可能也就七八万字，前面的民族志采用一种古典的写法，但这种古典不是在你知识生产复杂性和后现代的无知的情况下的古典，你是对它很清楚之后再写，那完全不一样。或者写成两个独立的文本，这要看你自己的选择。

我想应该化反复为简约，那种简约才是高品。亿万富翁吃，小菜、咸菜就可以是高品。你根本不知道繁复，只知道简约，你穷人吃小菜，那太正常不过了，不就是小菜吗？所以说我知道复杂，我再做一个古典的做法，不懂行的人一看就是古典的做法。懂行的人发现，无一处不透着反思，带着复杂的思维在里面，只不过我没有几句话把它写出来，但全包含在里面。这合着一种自由度和可能性。这你得练出来。接着再做一个关于对民族志在当下的很复杂的知识生产过程的反思的东西，体现复杂的知识传递关系，复杂的观念交织，其中可能有冲突，也可能没有。表述时注意有所选择、侧重，该浓墨重彩时就浓墨重彩，该淡时就淡，最终会海天一色，相得益彰。

知识生产是相对于共同体的知识生产，如果没有共同体，没有共同体的知识需求，干吗养这些人，发工资给他们什么的？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中国有一个时期就有人是这么认为的。一帮人在那儿闲着，养这么些人没有用，都给我生产去，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粮食。后来队伍慢慢庞大起来，形成了共同体，作用才产生的。怎样让文化构成社会，这是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一个社会何以可能？靠文化可能。靠什么文化？怎么可能？不管什么研究，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直接间接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它没有必要是一个共同体。

李: 您关于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对我也很有启发。您提到“参与观察”, 也可以“观察参与”, 并说您的思路很想做更大、更有延续性的东西, 那篇文章只是抛砖引玉。<sup>①</sup> 龙牌会的范庄与我住的九溪村很类似, 只是规模可能更大。

高: 我从 1996 年以来持续跟踪河北范庄龙牌会的发展。龙牌会的符号本来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相冲突的, 这群人与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的, 是被排挤与否定的, 但是经过运作, 全部的关系都理顺了, 原来的二元对立全部被实践过程所超越了。其实, 不管你做什么研究都是研究共同体。你看原来我们是区分的, 农民是农民, 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 政府是政府, 各归各的。但现在, 经过多年持续互动的过程, 各方都深深地搅在一起了, 让我们在细部看到了“当代社会”是如何发生的。当代社会的基本力量就是普通民众、知识分子专业队伍与政府, 有时会视讨论的议题还要加上经济领域的机构(盈利部门)。我们通过这个例子看社会如何可能, 看当下的社会如何可能。其实其他研究也是一样, 比如社会学做犯罪、越轨、自杀的研究, 如果有人自杀, 表明这个社会有环节缺失了, 那么多人自杀就表明社会漏洞太多了, 也是从反面来研究社会如何遇到了挑战、危机, 都是在回答社会何以可能这个基本的问题, 你也是用你的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主要是从文化上来回答。

一个议题能够被大社会所注意当然是优点, 但是过后呢? 注意是短暂的, 要想真正有长期的影响, 还是需要学术的维度。其实, 做学问就难在做什么和怎么做两个环节。

李: 我想把它集中在知识生产和主体与对象的互动上, 主要是包括我在内的以往和现在的学者登场和村庄发生的关系。

高: 这是一个辅助的和作为方法论支撑的研究, 但同时你还是要研究一个具体的东西, 比如地戏, 比如屯堡文化等等, 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欣赏, 等等, 并阐发它的意义。为什么要阐发意义? 是因为要那些人主动地把它连起来, 因为他们没有注意到那个东西, 只有你阐发了它的意义, 那些人才会因接受这个意义而接受那个东西, 它起这样一个作用。

李: 它是一个载体, 靠它做载体来呈现您所说的知识生产的过程。我在那里除了和村民交流外, 还和一些地方学者交往, 发现他们之间存在各种分歧。

高: 社会就是这样。知识生产是社会中的知识生产, 而不是社会外的知识生产, 把社会剥离开来的知识生产。

李: 如何找一些关键的术语来描述现在这种知识生产状态, 这也是我苦恼的问题。

高: 你有一个复杂的方法论的自我意识作为起点, 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具体研究什么, 用什么概念来研究。这是下一步的问题, 需要你自己反复琢磨。

(本文英文摘要见 P. 163)

[ 收稿日期] 2009-06-05

[ 作者简介] 高丙中(1962~ ), 男,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李 立(1970~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

<sup>①</sup> 高丙中. 知识分子、民间与一个寺庙博物馆的诞生[J]. 民间文化论坛, 2004, (3).





## Three Decades of Study on Leg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1978 ~ 2008

*Qi Jinyu*

**Abstract:** Legal anthropology as a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for anthropology and law, so far as it is concerned with traditional jurisprudence, has not only presented for us a new academic field, but also provided a unique and effec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a way of thinking.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past three decades of legal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existing documentation in China, has tried to explore the connecting point between the forefront achiev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eg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and China's leg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perience of localization of legal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a, provid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and pointed out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Key words:** Legal culture, pluralism, field research,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the civil law

(上接第 147 页)

## A Study on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Systematic Analysis on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n Yongjing*

**Abstract:** The Chinese Nation, composed of 56 ethnic group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an organic system with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She was gestated, formed and developed in a specific time-space coordinate with some characters of system, such as integrity, structure, hierarchy, dynamic, openness and correlation. Taking the system theory as the methodology, the author made some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ree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w to understand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w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diversity" and "unity", and how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diversified ethnic groups.

**Keywords:** System theory;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egrity; hierarchy; openness

(上接第 131)

## Writing abou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Ethnographical Methods: A Dialogue on How to Write about Culture in the Production Field of Knowledge

*Gao Bingzhong Li Li*

**Abstract:** This dialogue is centered on the discussion about how to write ethnography with a concer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village camp, and in ethnic field. This kind of ethnography demands 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mediate field where our field investigation is going on, it demands from us to see the village as a stage where the villagers, the academicians and the state participate in a continuous situation of interaction.

**Key words:** Ethnograph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nowledge production